

四川——长江经济带上的希望之星

Sichuan Province——The Hope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罗祖德 徐长乐 蒋雪梅 郑 燕

(华东师范大学软科学中心 上海 200062)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由沿海向内地纵深发展的大趋势,其突破口就是从长江西进。90年代以来,长江沿岸地区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位居下游口门地区的江浙沪皖3省1市的经济增长势头有增无减;中游的江西、湖南、湖北诸省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而位于上游的云贵川渝3省1市所蕴藏着的巨大经济潜能也正在加速释放出来,长江经济带业已成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最有希望的地区之一。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这个“龙头”已开始抬头,四川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尾”也势将随之起舞。

一、四川在西部开发中的战略态势

四川位于我国内陆腹心地带,地处中西结合部。对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四川是西部;对于西藏、云南、贵州而言,四川又是东部。四川在“依托通道,东靠西移,南连北往,开边出海”的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举足轻重的人口大省和市场大省

四川历来是我国的第1人口大省,1996年末人口数达11430万。重庆改为直辖市后,全省现有人口8357万,仍居全国第3位,市场容量与潜力十分巨大。全省现有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商店3.8万个,总量居全国前茅;省会所在地成都市已建成国家级期货交易所、人才市场和技术交易所,建成一批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大型批发市场;国务院已将成都市规划为中国西部地区的商贸、科技、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1996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091亿元,居全国第九位、西部第一位。

2. 是享有“天府之国”盛名的农业基地

1996年,全省粮食产量3484万吨,居全国第三位;油菜籽105万吨,蚕茧9.6万吨,肉猪出栏6069万头,均居全国第一位;全省农业增加值860亿元,居全国第五位。

3. 是我国西部半壁江山中的工业强省

四川省的电子工业是全国5大基地之一;机械工业是全国3大基地之一;国防工业则居全国之首;冶金、建材、食品、化工、医药等行业在全国也均占重要地位,并拥有中国最大的彩电生产企业长虹、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希望集团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集团)和三线企业。1996年全省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2346亿元,居全国第十位和西部10省市的首位;发电设备、彩电、白酒、钢、化肥、水泥等拳头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位居全国前茅和西部第一。

4.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西部的科技人才库和人力资源库

四川拥有一支雄厚的高新技术研制开发力量,在航天、航空、核能、光纤通信、生物工程、高分子化学等领域的研制能力均居全国重要地位。全省现建有两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6年全省有高等院校42所,在校学生13.1万人;现有劳动力资源5300万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近120万人;科技人员数和科研经费收入都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明显多于其他省区市;科技机构数(221个)列全国第四,仅次于北京、辽宁和江苏。

5. 江河纵横,以“川”得名,水能资源“富甲天下”,也是我国资源富集区

四川拥有全国1/5的水能资源,水能蕴藏量高达1.4亿千瓦,居全国第一位。闻名中外的长江三峡素有“上帝赐给中国的最好礼物”之称,二滩即将建成大型水电站。1996年全省水电装机容量达1030万千瓦,位列全国前茅。尤其是攀西地区,每平方公里可开发水电286万千瓦时,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倍,比世界水能资源密度最大的瑞士还大3.7倍,未来必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水电基地。四川的钒、钛、锂、银等11种储量居全国第一,硫铁矿、稀土矿储量居全国第二。且矿产资源地域分布好,开发关联程度高,适宜综合开发。四川的生物资源种类繁多,是中国的3大林区和5大牧区之一。四川的旅游资源更是名列全国前茅。中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风景区共7处,

其中四川即占了3处。全省现有国家级和省级文化名城31个,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53个,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07处。四川省资源条件最为得天独厚的是攀西地区。由于旅游、农业、生物、水能、矿产资源密集匹配,使攀西地区第一、二、三产业的资源综合利用潜力很大,极有可能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经济增长极。

二、四川——一座潜藏极丰的“富矿”

1. 二元结构的利弊之间潜蕴着契机和潜力

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因地域辽阔、地表自然条件千差万别而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呈现为典型的二元结构:城乡二元、工农二元、东西部二元。这一特征在四川也颇为显著。

(1)东西部二元。四川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明显。最新资料表明,1996年末上海人均GDP已达22 275元,而四川同期仅为3 763元(包括重庆市),两者相差4.9倍。按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计算,1996年末,上海人均GDP已达2 684美元,目前已超过3 000美元,已开始步入工业化后期的发达国家水平;而四川1996年末人均GDP只有453美元,只能属于工业化前期水平。若按GDP年均递增10%匡算,四川要达到东部目前的水平尚需要10年。同样,四川省内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东西部二元特征,位于东部的成都平原与位于西部的甘孜、阿坝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经济差距很大。根据1995年统计,成都平原经济区面积为全省的6.6%,GDP却只占了全省的44%;而西部的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占了全省面积的47.6%,GDP却占全省的1.7%。

(2)城乡二元。四川占全省总人口9%的城市人口生产出了全省90%的工业总产值,城乡经济差距十分巨大。从人均收入水平看,1996年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4 485元)是农民人均纯收入(1 453元)的3.1倍,高于上海同期1.7倍的比值。省会成都经济实力雄厚,在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中名列第一位,居西部之首;1996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357.4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七位、西部城市第一位。与此相对,四川广大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民生活水平低下,有54%的县为“老少边穷”县,属于国家扶贫帮困的重点。

(3)小块现代工业基地与大片落后的原始村落并存。建国以来直至70年代,四川一直是我国经济建设重点,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集中了一大批当时国内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和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在人烟稀少的荒山地带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等一批现代工业和科研基地。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资源配置方式与传统

二元经济结构的阻隔,这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尖端科研机构与地方经济缺乏内在联系,各自为政、相互隔绝,先进的工业及科学技术没有对发展地区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作出应有的贡献,至今还是小块现代工业基地与大片落后的原始村落并存,形成了山下是国际一流的西昌航天城,山上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村落的强烈反差。

(4)富饶的资源与贫穷的人口并存。四川有一些我国少有的自然资源富集程度高、组合条件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在水能资源、矿产资源、农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资重心向沿海东移等原因,使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强度减弱,目前已开发部分占可开发总量的比重过低。以攀西地区为例,钒钛磁铁矿探明储量100亿吨,远景储量接近200亿吨,可供开发设计的详勘矿区10处,储量39亿吨,现只利用了3处7亿多吨,仅占可供设计储量的18.7%。全区可开发的水能资源5.74万千瓦,已开发利用的不足1%,即使二滩水电站建成后,利用率也不到10%。全区的宜农荒地达400多万亩,宜林荒地3 000多万亩,宜牧用地3 000多万亩,农业和生物资源开发潜力极大。但攀西地区至今还有10个贫困县,贫困人口占了总人口的10%,而且又是多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0%,农业依然相当落后,粮食短缺状况严峻。

二元结构的经济既阻碍了四川经济的总体发展,但同时也给四川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空间和潜力。有落差才有势能,落差越大势能越大。水的落差和势能可以发电,经济的落差则提供了经济发展的空间。经济发展需要载体,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将带动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除成都外,四川似应再培育一批人口在50~100万的大中城市,以带动边缘地区中小城市(城镇)的经济发展,并辐射广大农村地区,达到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同时应加快农业的产业化进程,发展农产品加工增值产业,改变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输出方式,全面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实现农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另外,应尽快建立统一的资金市场、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打破条块分割和内向封闭格局,以城市为依托,建立区域性市场体系,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还应选择如攀西、川南这样水能、矿产资源富集和光热资源充足的地区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积极地、有步骤地加以开发开放,并尽可能提高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以增加新的生产能力,改善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面貌。

2. 盘活三线企业是四川二次创业的关键

“小绵阳”走出了个“大长虹”。这是盘活三线军工企业、成功实现三线企业二次创业的典范。六七十年代国家在四川的投资就达到360亿元,至今四

川国有资产的总价值仍居全国第6~7位,一旦巨大的存量资产盘活,必能释放出强大的能量冲击整个经济体系和市场体系。目前四川一些三线企业在贯彻实施国家提出的“军转民、内转外”的战略方针过程中,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子,企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长虹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国营长虹机器厂原是一个生产雷达的三线军工企业,其创业初期国家固定资产仅0.29亿元。70年代中期以后,该厂军品任务锐减,只有走开发民品之路。1984年该厂引进了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日本松下公司的彩电生产技术和装备。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为拥有设计和制造雷达、广播电视、仪器仪表等7大系列产品能力的大型电子企业,其中仅彩电生产线即达17条,年产彩电能力达400万台,是我国第一大彩电生产企业。长虹走过的道路是,结合自身技术特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注重吸收、改造和提高,从而从根本上促进了企业整体生产水平的提高。

3. “希望集团”带来了希望

四川经济中占绝对份额的是三线时期按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但非国有企业仍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一般具有机制活、人员精、包袱轻、适应市场灵的明显优势。东南沿海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坚定不移地构建了一个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其中国有经济占30%,非国有经济占70%。而四川非国有经济比重仅为45%,比全国平均比重低了12个百分点,比东南沿海低了25个百分点,这是四川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把人民群众中潜在的财力、物力、人力动员起来,对四川改变二元结构中贫穷落后的一面将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发展非国有经济主要是发展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四川曾最早举起农村改革的旗帜,希望集团、安都集团、威远集团等乡镇企业集团如雨后春笋般从四川这一片沃野中破土而出。安都企业集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它在中国100家最大私营制造企业中,目前排名第16位。该集团于1985年创业时,仅以200元钱起家,在遭受了一系列挫折失败后,终于研制成功生猪快速催肥剂,取得巨大经济效益。集团现有资产3亿元,成员企业22家,员工2000余人。安都集团的成功为四川民营企业的更大发展预示了广阔的前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者优势互补,必将给四川经济开辟出一个新天地。

三、依托通道,走出盆地

2000年前,李冰父子建成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都江堰工程,第一次开发了岷江,从此川西平

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盆地的封闭与农业的发展,在历史上给了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而在开放改革、行将走向21世纪的今天,封闭的盆地和难行的蜀道,亦给四川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考虑,四川的经济地理区位相对不利。由于地处内陆腹地、出海通道路途遥远,距最近的沿海口岸亦有数千公里,加之群山阻隔,四川的公路铁路建设事业均难以发展,其建设成本大大高于沿海地区。铁路作为现代化运输的主体,不仅省区内运力已基本饱和,且存在多个瓶颈口。此外,地形的封闭也带来了意识和观念上的保守与落后,这在更大程度上制约了四川经济的发展。然而,一旦观念转变,冲出大山、走出盆地,其爆发力则是巨大的。

1. 借港出海和开边出洋

现代经济的发展,某种程度上讲主要取决于区域的可达性。通达性是地区经济发展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地形阻隔,关山重重,就大大阻碍了四川的可达性。若没有通道,区域经济就无法发展。四川现有两条通道可开拓:一是“借港出海”,向东沿长江而下经上海入太平洋;二是“开边出洋”,向西经成昆铁路通过云南澜沧江出境入湄公河进入印度洋。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促使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从转移的态势上看,亚太地区是重点区域,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位居口门的上海首当其冲。因此,四川未来的发展应重点放在东通道,同时兼顾西通道。

人类的文明史是凭借着河流、海洋发展的,由流域文明走向地中海文明再走向大西洋文明;区域经济也是沿着水的轨迹逐渐发展起来的。流域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史所证明了的,最典型、最富成效的区域经济类型。长江所孕育的大流域经济,将是我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四川应当充分利用绵长的江岸,紧紧依托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充分发挥其“通江达海”的航运优势和综合功能,同时辅以快速便捷、立体交叉的陆空交通运输网络,冲出大山阻隔,走出盆地束缚,连接东西南北,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2. 依托长江

长江经济带位居我国的腹心地区,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自然经济梯度带,处于南北东西纵横交流的结合部,具有很强的边际效应,对全国各地的通达性良好,是一条水源带、资源带、能源带、产业带、城市带和财富聚集带(约聚集了全国1/2的财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长江经济带又是个有机的整体,其上中下游之间存在着衣带水、唇齿相依、同舟共济的密切联系。四川应依托长江,充分利用长江经济带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关联包括:

(1)产业关联 当前,长江流域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国家要求沿江各地区在国家规划的产业政策指导下,选择适合本地条件的发展重点和优势产业,避免地区间产业趋同化。四川目前还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而江浙沪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四川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加大与沿江各城市的合作。比如上海正进行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并已作出了一部分产业转移到长江流域的规划方案。而四川的成都等城市在电子、机械、冶金、化工、食品、轻纺等方面已有相当基础,问题是经济技术上大多处于粗放型经营和初级产品生产加工阶段,技术工艺落后,经营管理不善,产品品种单调,质量和市场占有率不高。因此,双方完全可以因势利导,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做到互惠互利,大大推动四川的工业化过程。

(2)市场关联 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在贸易上具有互补性。四川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消费大省,如果把东部沿海的优质产品和四川广阔的消费市场紧密结合,将会使两地取长补短,互有所得。同时四川产品也可打入东部市场。走“长虹”、“嘉陵”、各种名酒的道路。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应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强化“市场导向,宏观调控”的力度,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贸易壁垒的樊篱,充分发挥成都的西部贸易中心作用,加强与长江流域大城市的贸易往来,推动流域综合大市场的形成,以促进全省经济的大发展。

(3)各大城市资本关联 四川有资源、有设备、有人才,关键是缺资金;而下游有资金,主要是缺资源。特别是上海,财力雄厚,融资渠道广,金融机构健全,如能将上海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四川丰富的自然资源紧密结合,将会产生最大的合作效益。随着东部资本积累的大幅增加,已出现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举的局面,东部资本正在开始成为四川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四川也在不断改善投资条件,吸引更多的资金,走“你发财、我发展”的道路。四川还应拓宽融资渠道,在互利的前提下,向下游发行建设债券,筹集长江开发基金,吸引东部资金共同开发省内资源,力争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4)人才关联 东西部的交流关联,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全方位的交流,人员交流是至关重要的。解放以来,既有上海和华东地区的知青和科技人员源源入川,亦有 500 万“川军”的连年东进。在东进的“川军”中,既有低层次的打工仔打工妹,亦有高智商的经济文化人,到东南沿海创业。四川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走出去的人才,吸引他们回川再创业,同时有计划地派出人员到沿海学习,还可以利用挂职锻炼等方式请进沿海地区的人才。关键是要建好巢、筑好窝,才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为建设四川发挥力量。

(5)通道关联 四川与上海共享一条黄金水道,“君在江之头,我在江之尾”,同饮长江水,共受一江益。四川应充分利用长江通道的作用,顺江而下,借长江三角洲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优势,走向国际,走向全球。川沪都已提出整治长江干流及其支流、增加码头仓储等基础设施、规划沿江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加快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等措施。四川的重点应是加强川江航道的整治,大力发展水运业。有人说水运业是夕阳产业,这是糊涂观点。只有夕阳技术,没有夕阳产业,更不会有夕阳长江水运。水运是运输成本最低、货运量最大的运输方式,既是当今世界各国贸易往来和维系世界统一市场的主要运输方式(海运业),同时也是流域腹地地区外向开放、走向世界的天然运输方式。随着水运技术不断改进,终会使水运业重新兴起,那时长江就能发挥出相当于同样长度的 20 条铁路的运输能力。

(6)生态关联 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看,长江大流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基础。位居江之上游的四川,其长江两岸在历史上曾经森林连片、青翠连荫。李白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昔日的写照。可是近半世纪以来,四川的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我国已故著名林学家郝景盛先生面对长江两岸森林的严重破坏状况曾感慨地说:“长此下去,谁也不能担保,来日之长江不成今日之黄河。”如果真被郝先生不幸言中,那么长江大流域经济建设得再好,也将自毁于生态的恶化。长江大流域的生存与发展与长江大流域生态息息相关。处于长江上游这一关键区位的四川,对保证长江水质的洁净,控制泥沙的含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建立起大流域的生态观念,做到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互相兼顾,共建共荣,四川的良性发展才能得到全流域的支撑。

3. 500 万“川军”——走出盆地的开路先锋

四川是一个移民大省,历来有移民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历史上四川既不保守也不封闭。高山与盆地不但未能阻挡外界新经济因素的植入,恰恰相反,从历史上看,秦汉、唐宋、清代以及现代四川社会经济的几次大发展,皆得益于对外开放交流和对封闭性经济的改革。四川历史上曾几次较大的移民迁入迁出运动,其中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又称“西进”活动,有 500 万以上人口移入四川,持续达 150 年之久,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前无古人,以至于现在 80% 以上的四川人都自认是移民的后裔。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时间约 700 多万人入蜀,给四川带来了一大批学校、工厂,给当时的四川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而大三线建设更是建国以来四川省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高科技

人才入川最多、对四川的长远发展影响最大的一次大投入,创立了举世瞩目的工业“天府之国”——攀西。

美国人类学家苏珊·福雷克认为:“当一种文明侵入另一种文明的时候,经过初期阶段的流血和紊乱后,其结果往往是创造性的巨大进步和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集团是很有能量,甚或成功的集团。这几次大的移民不仅给四川的经济注入了活力,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四川独特的“移民文化”,造就了四川人在移动中求发展的意识、冒险的意识、超前的意识和个体自强不息的意识。所以才会有 20 多年前率先开创农村改革、县级经济改革的辉煌;才会有希望集团、安都集团、威远集团这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民营企业;才会有川股一直与上海、深圳投资三分天下的业绩。正因为这种移民文化,这种移民意识,才会有 1 000 万“川军”在省内省外流动,这一现象正是四川人深层文化观念的体现。这支庞大的“川军”队伍不仅支持了东部的建设,而且促进了四川经济的发展。四川有位领导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四川的外出民工是无烟的工厂,无本的银行,无课堂的学校,对我们四川省来讲是没有投入的产出。”川军每年寄回、带回四川约 300 亿元资金,相当于四川一年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些“川军”还带回了新的管理经验、新的生产技术、新的信息、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观念。许多人在东部学到一门技术,或积累了一定资金后回乡再次创业,直接带动了家乡的经济的发展。现在已有 38 万外

出民工回到四川,成为本乡本土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如果说存在着一种“鲶鱼效应”的话,那么这些人无疑会成为四川 8 000 万人中的“鲶鱼”,足以把四川这潭被自然环境封闭的、易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死水搅活,使四川经济更快地走出盆地。我们把湖广填四川的“西进”与美国开发西部时的“西进”作一比较的话,可以看到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果说历史上的“西进”造就了天府之国的辉煌的话,那么今天的四川民工东进和南下必将推动四川的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发展。

在一切生产要素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人的素质直接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关键是人的观念的转变。因为在一切转变中,观念的转变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困难的。四川省的领导在上海的一次专家咨询会上动情地说:“是四川的民工首先走出了盆地”,高度评价了 500 万“川军”在促进四川省领导观念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既定的沿江发展大战略给四川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此可谓四川的“天时”;四川处于中西结合部,又处于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区位,同时又依托于黄金水道长江,可谓恰得“地利”;更为重要的是,四川拥有一大批高科技人才,有 500 万代表四川人开放意识的“川军”,再加上 8 000 万吃苦耐劳的人民为后盾,可谓又得“人和”。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今四川三者已兼得,因此,四川成为长江经济带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已为时不远了。

(责任编辑 蔡德诚)

彩图说明

中国的报春花

胡启明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广州 510650)

中国素以植物种类丰富著称。世界各地每处园林无不有许多花木引种自中国;西方学者还把中国称之为“庭园的母亲”。在众多的名花异卉之中,报春花又是一佼佼者,它与杜鹃、龙胆并称为中国高山三大名花,全国共有 300 种,占全球种数的 3/5 以上,其中大多数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早在 1821 年英国人经过广州时即将藏报春(*Primula sinensis*)引入伦敦,次年开花,获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大奖,引起园艺界重视。自 19 世纪末至我国解放前夕,欧美各国不断派专人来我国采集报春花属植物种苗和标本,运回欧、美栽培,一时成为植物分类学界和花卉园艺界的热点,仅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就栽培了自我国引种的报春花 100 种以上。现在欧美各发达国家均设有报春花协会和经营报春花等高山花卉的种苗公司。不少原产于我国的种类已培育出许多园艺品种,广泛栽培于世界各地。报春花已成为草本花卉中重

要的一族。

我国学者研究报春花科植物始于 1935 年左右,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已于 1990 年完成了中国植物志报春花科的编研,纠正了许多西方学者在命名和鉴定上的错误,发现了不少新的类群,对分类系统提出了修正,并论证了报春花科植物的现代分布中心和可能的起源中心,在系统分类研究方面已达世界领先水平。近年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西亚高山植物园和庐山植物园已开展了报春花的引种栽培研究工作;但在花卉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我国当前的工作还远远落后于形势,与我国所具有的丰富种质资源极不相称。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部分我国特有和珍稀的报春花品种如彩图所示。

(责任编辑 王宏章)